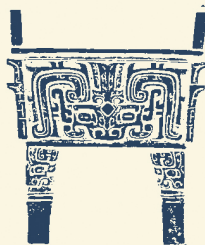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合订本)

第二卷 隋唐五代编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编委会 编



目 录

隋唐五代编

哲学、政治类

中说	〔隋〕王 通	2	天说	〔唐〕柳宗元	38
五经正义	〔唐〕孔颖达	5	天对	〔唐〕柳宗元	40
贞观政要	〔唐〕吴 兢	7	封建论	〔唐〕柳宗元	42
帝范	〔唐〕李世民	10	韩昌黎集	〔唐〕韩 愈	45
魏郑公集	〔唐〕魏 徵	14	原道	〔唐〕韩 愈	48
唐律疏议	〔唐〕长孙无忌等	16	复性书	〔唐〕李 翱	51
臣轨	〔唐〕武则天	19	白氏长庆集	〔唐〕白居易	54
唐六典	〔唐〕李林甫等	23	刘禹锡集	〔唐〕刘禹锡	57
龙筋凤髓判	〔唐〕张 鷟	25	仲蒙子	〔唐〕林慎思	59
女论语	〔唐〕宋若莘、宋若昭	27	皮子文藪	〔唐〕皮日休	61
翰苑集	〔唐〕陆 贽	30	无能子	〔唐〕佚 名	64
吕衡州集	〔唐〕吕 温	33	两同书	〔唐〕罗 隐	68
柳宗元集	〔唐〕柳宗元	35	化书	〔五代〕谭 峭	70

历史类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	74	南史	〔唐〕李延寿	93
北齐书	〔唐〕李百药	76	北史	〔唐〕李延寿	95
梁书	〔唐〕姚思廉	78	史通	〔唐〕刘知幾	97
陈书	〔唐〕姚思廉	81	通典	〔唐〕杜 佑	100
大唐西域记	〔唐〕玄 奘	84	元和郡县志	〔唐〕李吉甫	103
晋书	〔唐〕房玄龄等	87	蛮书	〔唐〕樊 绰	106
隋书	〔唐〕魏 徵等	90	旧唐书	〔五代〕刘 昫等	108

语言、文学类

语言	112	毛诗正义	〔唐〕孔颖达等 135
切韵	〔隋〕陆法言 112	文选李善注	〔唐〕李善 138
经典释文	〔唐〕陆德明 116	文选五臣注	〔唐〕吕延济等 142
一切经音义	〔唐〕玄应 119	河岳英灵集	〔唐〕殷璠 146
干禄字书	〔唐〕颜元孙 122	中兴间气集	〔唐〕高仲武 149
五经文字	〔唐〕张参 124	花间集	〔后蜀〕赵崇祚 152
一切经音义	〔唐〕慧琳 126	诗式	〔唐〕皎然 155
九经字样	〔唐〕唐玄度 129	本事诗	〔唐〕孟棻 158
韵镜	〔五代〕佚名 131	二十四诗品	〔唐〕司空图 161
文学	135		

艺术类

音乐	166	评书药石论	〔唐〕张怀瓘 204
乐书要录	〔唐〕元万顷等 166	文字论	〔唐〕张怀瓘 206
乐府解题	〔唐〕吴兢 168	六体书论	〔唐〕张怀瓘 207
教坊记	〔唐〕崔令钦 170	玉堂禁经	〔唐〕张怀瓘 208
通典·乐典	〔唐〕杜佑 172	法书论	〔唐〕蔡希综 210
羯鼓录	〔唐〕南卓 175	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唐〕颜真卿 212
乐府杂录	〔唐〕段安节 177	述书赋并注	〔唐〕窦臮、窦蒙 214
敦煌乐谱	〔五代〕佚名 179	论书	〔唐〕徐浩 217
敦煌舞谱	〔五代〕佚名 181	授笔要说	〔唐〕韩方明 219
书法	185	法书要录	〔唐〕张彦远 220
八诀	〔唐〕欧阳询 185	墨薮	〔唐〕韦续 222
用笔论	〔唐〕欧阳询 186	绘画	225
书法	〔唐〕欧阳询 188	唐朝名画录	〔唐〕朱景玄 225
笔髓论	〔唐〕虞世南 190	历代名画记	〔唐〕张彦远 227
书旨述	〔唐〕虞世南 191	园林	231
书后品	〔唐〕李嗣真 192	草堂记	〔唐〕白居易 231
书谱	〔唐〕孙过庭 194	寺塔记	〔唐〕段成式 232
书议	〔唐〕张怀瓘 198	宅经	〔唐〕佚名 234
书断	〔唐〕张怀瓘 200		

经济类

晋书·食货志	〔唐〕令狐德棻等 238	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唐〕陆贽 244
隋书·食货志	〔唐〕魏徵等 241	通典·食货	〔唐〕杜佑 247

策林	〔唐〕白居易	250	四时纂要	〔唐〕韩鄂	255
平赋书	〔唐〕李翱	253	旧唐书·食货志	〔五代〕刘昫等	257

科技类

太清石壁记	〔隋〕苏元朗	262	龙虎还丹诀	〔唐〕金陵子	302
诸病源候论	〔隋〕巢元方等	265	丹房镜源	〔唐〕佚名	305
夏侯阳算经		268	外台秘要	〔唐〕王焘	306
缉古算经	〔唐〕王孝通	270	海涛志	〔唐〕窦叔蒙	308
晋书·天文志	〔唐〕李淳风	272	茶经	〔唐〕陆羽	310
乙巳占	〔唐〕李淳风	274	四部医典	〔唐〕宇陀·元丹贡布	312
敦煌星图		276	石药尔雅	〔唐〕梅彪	314
步天歌	〔唐〕佚名	278	太上圣祖金丹秘诀	〔唐〕清虚子	316
备急千金要方	〔唐〕孙思邈	280	耒耜经	〔唐〕陆龟蒙	317
新修本草	〔唐〕苏敬等	285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唐〕蔺道人	319
食疗本草	〔唐〕孟诜	287	禽经		321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		289	阴真君金石五相类并序	〔唐〕佚名	322
开元占经	〔唐〕瞿昙悉达	293	丹方鉴源	〔五代〕独孤滔	324
大衍历	〔唐〕一行	296	金石簿五九数诀	〔五代〕佚名	325
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	〔唐〕陈少微	300			

宗教类

佛教		328	安乐集	〔唐〕道绰	371
大乘义章	〔隋〕慧远	328	净土论	〔唐〕迦才	374
法华经文句	〔隋〕智顓	331	成唯识论	〔唐〕玄奘	375
法华经玄义	〔隋〕智顓	334	因明入正理论疏	〔唐〕窥基	379
金光明经文句	〔隋〕智顓	338	异部宗轮论述记	〔唐〕窥基	382
金光明经玄义	〔隋〕智顓	340	成唯识论述记	〔唐〕窥基	384
摩诃止观	〔隋〕智顓	342	成唯识论掌中枢要	〔唐〕窥基	386
三阶佛法	〔隋〕信行	349	大乘法苑义林章	〔唐〕窥基	388
历代三宝记	〔隋〕费长房	352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	〔唐〕彦惊	390
国清百录	〔隋〕灌顶	355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三论玄义	〔隋〕吉藏	357	〔唐〕慧立、彦惊	393
中论疏	〔隋〕吉藏	360	集古今佛道论衡	〔唐〕道宣	398
法华玄论	〔隋〕吉藏	362	广弘明集	〔唐〕道宣	400
大乘玄论	〔隋〕吉藏	364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	〔唐〕道宣	403
四分律疏	〔唐〕法砺	366	四分律含注戒本	〔唐〕道宣	405
辩正论	〔唐〕法琳	368	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	〔唐〕道宣	406

- 释迦方志〔唐〕道宣 407
 释迦氏谱〔唐〕道宣 409
 大唐内典录〔唐〕道宣 411
 续高僧传〔唐〕道宣 415
 古今译经图纪〔唐〕靖迈 421
 俱舍论记〔唐〕普光 424
 俱舍论疏〔唐〕法宝 426
 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唐〕神泰 428
 因明入正理论疏〔唐〕文轨 430
 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唐〕智俨 433
 法苑珠林〔唐〕道世 435
 古清凉传〔唐〕慧祥 441
 观无量寿佛经疏〔唐〕善导 444
 四分律开宗记〔唐〕怀素 446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义净 447
 南海寄归内法传〔唐〕义净 451
 华严经金狮子章〔唐〕法藏 454
 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唐〕法藏 457
 大乘起信论义记〔唐〕法藏 460
 华严经探玄记〔唐〕法藏 462
 华严经传记〔唐〕法藏 465
 坛经〔唐〕慧能 467
 禅宗永嘉集〔唐〕玄觉 470
 成唯识论了义灯〔唐〕慧沼 473
 成唯识论演秘〔唐〕智周 475
 大日经疏〔唐〕善无畏、一行 476
 开元释教录〔唐〕智升 479
 金刚碑论〔唐〕湛然 485
 北山录〔唐〕神清 487
 华严经疏钞〔唐〕澄观 490
 原人论〔唐〕宗密 495
 禅源诸论集都序〔唐〕宗密 498
 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唐〕海云 504
 传心法要〔唐〕希运 507
 祖堂集〔五代〕静、筠 509
 释氏六帖〔五代〕义楚 515
 宗镜录〔五代〕延寿 519
道教 521
 金镇流珠引〔唐〕李淳风 521
 道教义枢〔唐〕孟安排 526
 三洞珠囊〔唐〕王悬河 528
 宗玄先生玄纲论〔唐〕吴筠 530
 元阳子五假论〔唐〕元阳子 532
 金碧五相类参同契 534
 枕中记〔唐〕孙思邈 536
 玄珠录〔唐〕王玄览 538
 坐忘论〔唐〕司马承祯 541
 服气精义论〔唐〕司马承祯 543
 天隐子〔唐〕司马承祯 545
 洞灵真经〔唐〕王士元 547
 黄帝阴符经疏〔唐〕李筌 550
 钟吕传道集〔唐〕施肩吾 554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唐〕佚名 559
 太平经钞〔唐〕闾丘方远 560
 太平经圣君秘旨 563
 四气摄生图〔唐〕佚名 565
 道体论 568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五代〕杜光庭 570
 道德真经广圣义〔五代〕杜光庭 572
 历代崇道记〔五代〕杜光庭 574

隋唐五代编

哲学、政治类



中说〔隋〕王通

《中说》，又名《文中子》，十卷。隋王通撰。实际是王通和门人的问答笔记，由薛收、姚义编缀而成，后由其子王福峙编定为十卷行世。《中说》在北宋时，有阮逸刊印注释本和龚鼎臣刊印注释本，前者流传至今。另有1936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等。

王通(584—617)，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朝思想家。出生于儒学世家，隋秀才高第。十八岁时，“有四方之志”，到处游历问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文中子序》)。仁寿三年(603)，西游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文帝大悦。下其议于公卿，公卿皆不悦，未能见用。不久，在偏僻的蜀郡为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初年，从蜀郡回乡，路过长安，拜访了一些朝廷官吏，见已无再仕的希望，心情愤闷，赋诗：“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东征之歌》)于是退居乡里，从事著述和讲学。朝廷屡征召出仕，均被拒绝。王通死后，门人私谥之曰文中子。王通曾著《六经》，已佚。因其事迹不彰，自宋以来，学者对王通其人、《中说》其书之有无，均曾提出疑问。近人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辨之甚析，谓“隋时实有王通其人，唐时实有《中说》其书”，引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谓《中说》乃出其门人弟子所记，“并依附时事而附益之也”。王通在讲学期间，门人程元、仇璋、董常、薛收等都有记录。后来，薛收和姚义汇集所记，并写了卷首和序言。王凝曾比较客观地说：“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继殁，文中子之教未作矣。呜呼，以俟来哲”(《关朗》)。所谓“对问之作”，就是指《中说》。《中说》中王通的言论，主要是根据他们四人的记录整理而成。

《中说》的篇名是《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它的主要思想如下。

一、三教归一。隋代儒、佛、道并存，但如何调和三教，使之各有一定的地位，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适应这一政治需要，《中说》提出了三教归一的主张。认为“政恶

多门久矣”(《问易》),三教长期互相攻讦、争斗,对国家不利。但也不能废除佛、道二教,有弟子问:“废之(指佛、道二教)何如?”王通说:“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从风止燎耳。”(同上)说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都曾以行政手段毁灭佛教,但他们死后,继起的君主又变本加厉地推崇佛教,无异于“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三教各有其用,要通权达变,不可固执一方。“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周公》)必须使各家互相通融,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在三教共融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教归一的思想。《问易》篇载:“子读《洪范说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但三教归一该有个主次,《中说》主张以儒家为主,因为治国安邦的“先王之道”就在儒家《六经》之中:“《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魏相》)

二、复王道。《中说》尊崇王道,以儒家礼乐仁义为贵,“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王道》)。希望统治者实行王道政治,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理想社会。但现实社会中像尚书令杨素那样“作福、作威、玉食”(《事君》)的人,比比皆是,“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同上)于是用古今对比的方法描绘了王道和暴政不同的情景,“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事君》);“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同上);“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同上)。显然,前者是对王道的构想,后者是对暴政的鞭挞。王道固然难行,但认为王道政治总有一天会实现。“贾琼问:‘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诰,两汉之制,粲然可观矣。’”(《问易》)所以仍对前途充满信心,并要为之奋斗不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古者谓之继时。《诗》不云乎,‘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废也”(《立命》)。

三、法宽刑简。《中说》认为,为政必须以“中道”为原则,与其过猛,毋宁失之于宽;行法与其过急,毋宁失之于缓;刑狱与其过繁,毋宁失之于简。指出:“政猛宁若恩,法速宁若缓,狱繁宁若简……执其中者,惟圣人乎?”(《关朗》)只有“圣人”才能实行这样的“中道”。并憧憬两汉“七制之主”时役简刑清的局面。“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天地》)这种观点虽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但其要求役简刑清的思想溢于言表。

四、轻徭薄赋。《中说》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是“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问易》)。即不声不响地实行符合民意的治国之道,办好一切民间的事。因此,它主张实行有利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多敛之国,其财必削”(《王道》)。多敛的结果,是民不堪命,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家赋税的来源。“叔恬曰:‘舜一岁而巡五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子

曰：‘无他道也，兵卫少而征求寡也。’”(同上)同时，也主张少征徭役。《礼乐》篇载绛郡通守陈叔达请王通劝说官吏息役之事：“子在绛，出于野，遇陈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将之夏。’陈守令劝吏息役。董常闻之，曰：‘吾知夫子之行国矣，未尝虚行也。’”(《礼乐》)既然请王通劝吏息役，必然知道他是主张息役的。对于隋炀帝大修运河之役也非常反感：“御河之役，子闻之，曰：‘人力尽矣。’”(《魏相》)

《中说》以复兴儒学的统治地位为己任，法古非今，“欲以周公之礼乐，治当时之天下……舍孔子无足法者，然则使通而在，犹不能致治平也，况其徒乎！”(李贽《藏书·王通》)然而其政治法律思想，恰恰反映了安于守成、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政治要求，自中唐以后逐渐发生影响，王通也被誉为一代儒宗。对唐代儒学的复兴和宋代理学的形成，均起过一定的启迪作用。

有关“文中子”及《中说》的研究，可参看尹协理、魏明《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骆建人《文中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李小成《文中子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

(杨鹤皋)

五经正义〔唐〕孔颖达

《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唐孔颖达等撰。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奉敕编成，后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收入《十三经注疏》。通行本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今人的校点本。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生于北朝，少时曾向隋代经学家刘焯问学。隋炀帝大业(605—616)初，举明经及第，授河内郡博士，到唐代，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诸职，并奉命与颜师古等编撰《五经正义》。孔氏根据南朝经学约简、以玄学治经和北朝经学深芜、引用讖纬的特点，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形成唐代的义疏派。

《五经正义》是孔颖达奉敕编定的经学义疏，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易》主王弼、韩康伯注，《书》主伪孔安国传，《毛诗》主毛公传、郑玄笺，《礼记》主郑玄注，《左传》主杜预解。自唐高宗颁行以后，成为士人必须诵习的经科读本。

《五经正义》中含有哲学、政治思想的著作是以《周易正义》和《礼记正义》为代表。《周易正义》在其作者的自序中说：“唯魏世王辅嗣(弼)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于是奉命对《周易》的各家注本“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王弼)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孔颖达在王弼注的基础上对《周易》的义理颇多发挥。他认为“夫易者变化之总名”。在道和器的关系上，他主张“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周易正义》卷七)，即“先道而后形”。对于《易》中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的解释是：“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故云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同书卷一)认为

自然界的运动发展“天行健”和人事社会的“自强不息”精神是一致的。这里所谓“人事法天所行”虽是先秦时代以来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沿袭,然而强调“运动”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共同的特点,却是富有哲学意义的。

《礼记正义》在一开头就对“礼”进行了解释:“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视“礼”为天地之先的根本原则,它不仅“经天纬地”,而且是治理人事社会的大本。因为“礼者理也”,“礼”的本身就是天“道”或天“理”。“礼”的作用是“所以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礼不逾越节度也”(《礼记正义》卷一)。又说:“凡为礼之法,皆以忠信仁义为本,礼以文饰。行修者忠信之行修,言道者言合于仁义之道。质,本也,则可与礼为本。”(同上)突出儒家重礼的观念,提倡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主张言行要以仁义忠信为本。

在《毛诗正义》里,作者叙述了对《诗经》的社会作用的想法:“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黜,亦怨刺形于咏歌。”(《毛诗正义序》)

在《春秋左传正义》里,作者认为,前汉、后汉经学家,注释《春秋左传》往往“杂取公羊、穀梁以释左氏”,因而不免有“方凿圆枘”之弊,故以为“今校先儒优劣,杜(杜预)为甲矣”,因为杜预“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春秋左传正义序》)。

至于《尚书正义》,作者采用孔安国的传释。其理由是孔氏所得《古文尚书》可靠:“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左学者咸悉祖焉。”而后来的经故派注释家们有“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的毛病,所以他撰《尚书正义》,欲做到“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尚书正义序》)。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为古代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

相关研究著作,有张宝三的《五经正义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等。

(潘富恩)

贞观政要〔唐〕吴兢

《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编撰。通行本为元戈直采柳芳等二十二家注释，于元至顺间整理编注的“集论”本。另有明洪武初南雍刊本、清初朱载震刊大字本、1919年上海扫叶山房《百子全书》本等。日人原田种成有《贞观政要定本》，包括正篇二百五十章，附篇二百五十章，补篇十五章，搜罗较备。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史学家。自幼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周时，入史馆，编修国史，直书不讳，被誉为“当今董狐”。武则天以朋党为是非界线，史录多不实，他别撰《唐史》、《唐春秋》，立志留信史于后人。唐中宗时任右补关、起居郎、水部郎中，曾与当时著名史学家刘知幾等人先后参与编撰《则天实录》、《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唐玄宗时任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累迁太子左庶子。《旧唐书》卷一〇二、《新唐书》卷三二有传。

《贞观政要》约成于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它分类编撰贞观年间(627—649)唐太宗和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王珪诸大臣的策问、诤谏、议论与奏疏，内容广泛，较全面地反映了贞观之治的光辉业绩。吴兢值“开元盛世”，他透过繁荣昌盛的景象，看到初露端倪的社会政治危机，深感要继承和发扬贞观之治，必须引起唐玄宗统治集团的警觉，使认识到创业维艰，守成亦不易。因此，他用编撰《贞观政要》，“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贞观政要序》)，以为史谏，进呈唐玄宗，“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庶使“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上〈贞观政要〉表》)

《贞观政要》实际上是对唐太宗君臣治国政治经验的总结。全书十卷四十篇，二百五十八章，共八万字左右。具体篇目为：君道第一，政体第二，任贤第三，求谏第四，纳谏第五，君臣鉴戒第六，择官第七，封建第八，太子诸王第九，尊敬师傅第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规谏太子第十二，仁义第十三，忠义第十四，孝友第十五，公平第十六，诚信第十七，俭约第十八，谦让第十九，仁恻

第二十,慎所好第二十一,慎言语第二十二,杜谗邪第二十三。悔过第二十四,奢纵第二十五,贪鄙第二十六,崇儒第二十七,文史第二十八,礼乐第二十九,务农第三十,刑法第三十一,赦令第三十二,贡赋第三十三,辨兴亡第三十四,征伐第三十五,安边第三十六,行幸第三十七,畋猎第三十八,灾祥第三十九,慎终第四十。在总结“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时,对唐太宗的政绩及其晚年的衰退腐化,均直书不讳,尤为难能可贵。

《贞观政要》一书以《君道》篇开首,而终以《慎终》篇。如此安排,体现了作者的用心良苦和深远见地。《君道》篇开宗明义指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并以这两句话为总纲贯穿全文。如“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政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教戒太子诸王》)。它的主要政治思想如下。

一、安人宁国。唐太宗及其统治集团吸取隋朝骤亡的教训,“动静必思隋代,以为殷鉴”(《刑法》)。他们从各方面指出隋炀帝残酷地剥削人民,“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君道》)。最终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推翻了隋王朝。为了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缓和同人民的矛盾,唐太宗君臣总是紧紧围绕“安人宁国”这个总题目施政行法。这在《贞观政要》中有较详记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时,其可得乎?’”(《务农》)谏议大夫王珪十分赞同太宗的看法,并点出其关键在于“安人”,希望太宗“慎终如始,以尽其美”(同上)。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并加以总结说:“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同上)

二、明正赏罚。唐太宗君臣十分重视赏罚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封建》)魏徵也指出,赏用以劝善,罚用以惩恶。所以,赏罚之得失,关系国家的安危。必须做到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刑法》)。如果“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成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择官》)。此外,《贞观政要》记述唐太宗君臣关于执法不畏权贵的言论和事例也较多,如贞观二年(628)太宗和中书令房玄龄等讨论公平执法问题时,赞扬诸葛亮“尽忠益时者,虽讎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公平》)。他还要求执法官吏“按举不法,震肃权豪”(《贪鄙》),不畏权贵,公平执法。

三、求谏纳谏。唐太宗从谏如流,这在封建帝王中是首屈一指的。在他“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的思想影响下,许多臣僚都能犯颜直谏,面折廷诤。太宗深知治国必须有忠良辅佐,并使他们

敢于犯颜直谏,以匡正自己的过失。“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求谏》)在唐初大臣中,以魏徵的犯颜直谏最为突出。他所陈谏多达二百余事,多为太宗所采纳。对匡正太宗的失误,大有裨益。魏徵病故后,太宗悲痛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得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殁逝,遂亡一镜矣!”(《任贤》)他并发布诏令,号召群臣以魏徵为榜样,做到直言无隐。太宗懂得自己的才智有限,统治天下,事务繁多,必须“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政体》)。必须群策群力,发挥臣下的才智,“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同上)贞观十一年(637),他还下诏,要求臣下各尽其言,共同治理好国家。“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过恶,所以共为治也”(《君道》)。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认识,难能可贵。

四、宽简恤刑。《贞观政要》记录了大量有关法律方面的君臣议论,总的观点是立法应公平宽简,执法应审慎恤刑。唐太宗君臣强调立法公平,法律应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统一标准。魏徵说:“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公平》)切不可舍法不用,徇私枉法,任凭喜怒。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宣称,要“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并赞扬诸葛亮立法公平:“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秤),不可为人作轻重’,况今我理大国乎?”(同上)必须做到公平立法,不以私乱法。同时立法务求宽简。太宗即位后,贞观元年(627)就下达了“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刑法》)的诏令;贞观十年(636)则更全面而具体地谈到立法宽简的问题:“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赦令》)并强调立法应稳定,“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议,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刑法》)。唐太宗君臣更总结隋炀帝“生杀任情”的历史教训,要求执法“务在宽平”(《刑法》)。建立死罪案件应经九卿审议,并经“五覆奏”方可执行的制度。

《贞观政要》的有关记事远较《唐书》、《资治通鉴》为详,为研究唐太宗和初唐政治的重要参考资料。所用专题记事、分类排纂的史书编纂方法,亦有独创的特色。本书宋元间已有二十余家注本,近现代也有不少校本和译注本。

(杨鹤皋 朱顺龙)

帝范〔唐〕李世民

《帝范》，二卷，一作四卷。唐太宗李世民撰。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一说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后世常以武则天《臣轨》与之合刊。《旧唐书》、《新唐书》皆有著录，至宋时已佚其半，元吴莱征云南爨夷时，始得完书。后编入《永乐大典》，清乾隆间四库馆臣复从中辑出。清时又有日本宽文本传入。主要版本有日本宽文年间(约当清嘉庆间)刊本，清咸丰间伍氏《粤雅堂丛书》据日本传本刻本，1924年东方学会铅印罗振玉据日本宽文本校刊本；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乾隆至道光间长塘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校刊本及民国十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李世民(599—649)，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唐王朝建立者李渊次子，626—649年在位。隋大业十三年(619)，策动其父起兵反隋。建唐后，封秦王，屡统兵出征，扫平群雄，逐次统一全国。置文学馆，集十八学士，以供咨询。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获帝位，次年改年号贞观。适时变更，确定“偃武修文”国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为相，强化中央集权，修订律令，简政裁员，严行考核，发展科举制度，注意吸取庶族士人参政，扩大统治基础。注重发展经济，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对外防止侵扰，促进四邻间经济文化交流。对内加强各民族间联系。重文教，行崇儒兴学政策，以儒学为治国指导思想，以道德、学问为选官标准，重用儒生。大力发展学校，贞观年间国子监规模宏大，常住生员达三千余，并可容八千人讲学，是7世纪中叶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并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完备的教学制度。注重文化建设，亲自过问修史和整理经书古籍。性好求知，通经明史，能诗善赋，长于书法。其在位期间政绩卓著，以“贞观之治”著称于世。晚年纳谏之心有懈，决策亦有重大失误。一生所著诗文诏令汇为《唐太宗集》。生平资料见《旧唐书》与《新唐书》之《太宗本纪》，及唐吴兢所撰《贞观政要》。

《帝范》专为太子李治而著，为诫子论政之作，实为帝王“家训”，其序云：“汝(指李治)以年幼，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穡之艰

难。余每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已降，运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涣焉。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言辞恳切，深以继位者为忧，其意已远远超出一般家训。文体骈散兼用，语句典雅优美。原有唐贾行注和韦公肃注，今本注无姓名，疑为元人因旧注而补作。

本书之首有《序》。先述帝王之位乃皇天眷命，“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全凭王者“克明克哲，允文允武”得之。次写自己创业之艰难：以弱冠之年，“躬擐甲冑，亲当矢石，夕对鱼丽之陈，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欃枪而廓八紘”。再表撰著之目的：希望太子以史为鉴，持身治国，“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以保唐朝长治久安。

正文分为十二篇。

一、《君体》。阐述帝王治理天下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宽大其志，足以兼苞；平正其心，足以制断”。威德致远，慈厚怀民，仁抚九族，礼接大臣，“奉先思孝，处后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二、《建亲》。论述分封亲族对稳固帝位的重要性，列举历史上周、秦、汉、魏各代实行封建与否的得失，强调“封建亲戚，以为藩卫”。认为实行分封须注意防止两种偏差：一是“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导致诸侯反叛朝廷；二是“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隆”，会使帝王孤立无援。如欲既分封置屏，又不致为害，“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

三、《求贤》。说明求贤任贤对创业治国的重要作用：“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这是因为，“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鹤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治国也，必藉匡弼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则逸”。强调要看重人才的价值：“虽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要求认识人才的特点，注意搜访求索：“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候风云之运；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以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才，搜扬仄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四、《审官》。论述如何审察、选择、任用官吏，以为治国安邦之要。以巧匠制木为喻，先说明“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因材而用：“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再指出：“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劣智者，不可责以大功。”同时，“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小才不可大用，大才也不可小用，量才授官，方能于国于民有益。

五、《纳谏》。阐述国之兴衰，其要在于君主能否听取谏劝。认为“王者高居深视，亏聪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因此必须“倾耳虚心，仁忠正之说”。只要其议可观，其理可用，就不必在意其方式方法，不必在乎其身份贵贱。由此造成“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君臣之间无“隔情”的朝风。

六、《去谗》。描绘谗佞之徒的嘴脸,指出其危害,告诫后代帝王远谗臣,杜谗言。指出谗佞之臣的若干特征:“争荣华于旦夕,竞势利于市朝”;巧言令色,阿谀奉承,取悦君上;朋党比周,迫害忠良。并分析了谗臣难绝的客观原因:“良由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因此君主应懂得“病就苦而能消”,“命因甘而致殒”的道理。

七、《诫盈》。主旨在于反对奢侈,着重说明帝王如奢侈无度,将会招致“倾危”之患。指出,如君主高台深池,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必致徭役烦,人力竭,赋敛重,民财匱,农商之业废,人民糟糠不足,“佚乐未终,而倾危已至”。要求帝王“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民不劳,静则下不扰”。

八、《崇俭》。说明节俭对于治国理民的意义。提倡效法古时贤君,“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飭,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进而要求节制情欲,紧闭耳、目、口、鼻、身五关,“五关近闭,则令德远盈”。荣辱、安危,全系于崇俭与否。

九、《赏罚》。阐述赏罚得当于治理国家十分重要。由天有寒暑论及国须有赏罚。认为治国既要讲仁爱行赏,又须立教令施罚。“显罚以威之,明赏又化之”,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罚之诫民不犯法,赏之劝民安其业。

十、《务农》。认为农业是富国、富家之本,表达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沿袭“仓库实则知礼节,衣食乏则忘廉耻”的思想,强调“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主张禁绝技巧,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欲反其真”,以养仁义之心,绝贪欲之念。

十一、《阅武》。指出好战与忘战皆不可取,并说明战备和用兵的目的与原则。认为“好战则民雕”,“忘战则民殆”;兵甲“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原则是“农隙以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并赞同孔子“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告诫,以为用兵目的在于“利天下”。

十二、《崇文》。着重阐明文治在战争结束后的必要和重要。认为天下平定后,治国方针应适时变更:“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此主张“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研精六艺”。表明唐前期文教政策的基本精神。并自觉认识到军事行动和文化建设具有不同作用,故须因时而用,有所侧重:“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本书之末有《后序》。强调十二篇乃帝王施政纲领,坚持之,国将兴;背弃之,国必亡。“安危兴废,皆在兹乎!”进而指出:“非知之难,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终实难。”知道纲领不难,将其付诸行动却难,坚持实行到底更难。最后总结即位以来的过失,告诫太子以之为戒。并提醒“汝无纤毫之功”,尤应崇善广德。“且成迟败速者,国之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之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帝范》十二篇每两篇成一组,其意或相对,或相近,或相辅,叙述某一方面为君之道,情感饱